

xīnyǐmín wénxué mànlùn

作家出版社

新移民文学漫论

吴奕锜等 著

新移民文学漫论

吴奕锜等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移民文学漫论/吴奕锜等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5.3

ISBN 7-5063-3223-X

I. 新... II. 吴... III. 现代文学—文学评论—世界—
文集 IV. I1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21479 号

新移民文学漫论

作者: 吴奕锜等

责任编辑: 周 坤

装帧设计: 杨 玲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389299 (出购部)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揭阳市新华印刷厂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16 万

印张: 8

印数: 001-2000 册

版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3223-X

定价: 16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吴奕锜 研究员。现任职于暨南大学《暨南学报》编辑部。学术兼职：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理事、副秘书长。

曾任汕头大学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一级学会——“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会刊《华文文学》杂志主编。多年来一直从事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已出版有《回望与寻找》、《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编》(合作)、《海外华文文学史》(1-4卷，合作)、《菲律宾华文文学史稿》(合作)等，并在《文学评论》、《文艺理论与批评》、《文学半年刊》(新加坡)、《菲华文坛》(菲律宾)等国内外刊物发表学术论文30多万字。

写在前面的话

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以降，也就是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的近二十多年来，先后走出国门去寻找另一种生存生活方式的人数，据统计约有好几十万之众。他们或留学、打工、经商，或陪读、移居、定居，或多种目的身份兼而有之。在这一批人当中，不管他们当初远行的初衷如何，出去后境遇怎样，但可以肯定的是，离家去国的这一段日子，毫无疑问地已经成为了他们生命之旅中最为铭心刻骨的一段心路历程。这里所谓的“新移民文学”，显然不是指上个世纪初期的诸如鲁迅、郭沫若等人为代表的以开启民智呼吁救亡的、早已被纳入现代文学范畴的那部分域外之作，也不是 60 年代期间以於梨华、白先勇、赵淑侠为代表的早已在学界有了约定俗成的称谓的“留学生文学”，而是特指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出于各种各样目的（如留学、打工、投资等等），由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等地移居国外的人士用华文作为表达工具所创作的、反映其移（定）居国外期间生活境遇、心态等诸方面状况的文学作品。

如果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是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才兴起的一门新兴学科，那么，“新移民文学”研究无疑则是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更为崭新的研究课题。大约在七八年前，为了完成由陈贤茂教授主持的《海外华文文学史》的撰写任务，也为了使得我们这部《海外华文文学史》的覆盖规模更为广泛些，

我只好硬着头皮将当时自己心中几乎没有任何印象的“新移民文学”部分的写作任务应承了下来。可以说，当时我们所知道的“新移民文学”创作，一切的一切都是正在遥远的海外各国发生着、进行着，没有任何的资料积累，也没有任何可供借鉴的研究成果，但应承的任务总得完成。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摸索，按照着“摸清大体情况，总体介绍评述”的思路，终于写出了近三万字的文稿，作为一章忝列于《海外华文文学史》中。

完成了《海外华文文学史》的写作任务后，我一直对“新移民文学”部分“耿耿于怀”，经过一段时间的重新整理思路，分别从新移民的生存困境、文化冲突、身份问题、写作范式等几个方面进行思考，改写成几篇文章分别发表在《文学评论》、《文艺理论与批评》、《暨南学报》、《湖北大学学报》等刊物上。与此同时，我所指导的两位研究生刘华和王文艳，恰好也有兴趣跟着我将她们关注的目光投射到新移民文学上面并以之作为她们学位论文的选题：刘华的《论新移民文学的文学意蕴》取宏观俯瞰的态势，审视新移民文学中所蕴涵的文化内涵；王文艳的《跨越疆界——全球化语境下的虹影创作》则以其颇具理性的眼光，在全球化语境下对旅英华人女作家虹影进行个案解读。一宏观一微观，各辟蹊径，各有洞见。而《文化视野下的澳洲华文小说》和《在异域与本土之间——论北美新移民文学》则是陈绪泉和张长青入学不久的新尝试，他们力图用自己的视角认识和解读澳洲和北美两地的华文文学，也都各具特色。这几位青年学子，不仅有较为充裕的时间搜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细读文本，而且各各都有其独到的眼光和敏捷的才思，文章写得都比我漂亮。本来，把我的文章和他（她）们的论文放在一起，是有点自我曝丑的不明智，但好在有那句“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故人”的托词聊可自我解嘲。

“新移民论新移民文学”部分，出自旅美作家、评论家陈瑞

琳女士的手笔。陈瑞琳原是西北大学中文系的才女，写得一手漂亮的评论文章。出国之后，以新移民的身份来写新移民文学的评论文章，既感同身受，又富于“诗学”意味。其中所倾注的浓浓的情和所阐发的幽深见地，当不是我们这些隔着十万八千里、“望洋兴叹”“生造”出来的文字所能比匹的。征得她的同意，我特选取了她的几篇名文，略作删改之后作为压轴之作，目的全在于借其为这本小书撑撑门面。谢谢陈瑞琳！

最后，有必要说明的是，由于所有的文章原先写作时都是各自独立成篇的，现在凑在一起时免不了会出现某些论述上的重复，尽管我在成书时作了全面的统稿，但为了照顾各自文章的完整性，还是无法完全删除某些必要的重复，这是要请读者谅解的。

以下是其他各位作者所承担部分的情况：

张长青：在异域与本土之间——论北美新移民文学

陈绪泉：文化视野下的澳大利亚华文小说

刘 华：论新移民文学中的文化意蕴

王文艳：跨越疆界——全球化语境下的虹影写作

陈瑞琳：“新移民论新移民文学”全章

吴奕铸

2004年岁末于暨南大学

目 录

写在前面的话·····	1
◆ 漫论 ◆	
新移民文学中的生存书写 ·····	1
差异·冲突·融合 ·····	10
新移民文学中的另类写作 ·····	20
新移民文学中的身份问题 ·····	28
在异域与本土之间——论北美新移民文学 ·····	41
文化视野下的澳大利亚华文小说 ·····	67
◆ 专论 ◆	
论新移民文学中的文化意蕴 ·····	96
跨越疆界——全球化语境下的虹影写作 ·····	139
◆ 新移民论新移民文学 ◆	
风景这边独好——当代北美华文文坛概览 ·····	191
冷静的忧伤——从严歌苓的创作看海外新移民文学的特质 ·····	206
风雨故人，交错彼岸——论张翎的小说新作《交错彼岸》 ·····	221
“金山”烟雨见苍黄——论刘荒田的“假洋鬼子”系列 ·····	228

“新移民文学”中的生存书写

向往与寻找更加理想的生存生活方式，是人类的天性；而国际间的移民活动，就是人类这一天性的具体显现。对生活在经济相对落后环境中的中国人来说，向外移民无疑是尽快改变自己生存生活环境的一种有效的方法。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以降，也就是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的近 20 余年时间里，先后走出国门去寻找另一种生存生活方式的人数，据统计约有好几十万之众。他们或留学、打工、经商，或陪读、移居、定居，或其中的两种三种兼而有之。在他们当中，除了极个别是拿着优厚的奖学金或是出去继承遗产，属于不愁衣食的幸运儿之外，绝大多数在“初抵贵境”的前几年里，都有着一个艰难的适应、挣扎过程。若干年后，在他们的境况稍有好转之时，那些喜欢舞文弄墨的“文人”或“准文人”们，纷纷拿起了手中的笔，诉说着这些年来身居异域奋斗求生存求发展的坎坷经历与万千感想，于是，在海外华文文坛中也就出现了诸如《北京人在纽约》（曹桂林）、《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周励）、《我的财富在澳洲》（刘观德）、《陪读夫人》（王周生）、《上海人在东京》（樊祥达）、《东京都的福建先生》（黄星夜）、《绿卡梦》（毕熙燕）等这样一批被称之为“新移民文学”的作品。

“生存是残酷的”。这是处身于充满竞争的当代社会的人们对自身生存环境的感叹；而对于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迁徙的新

移民来说，其生存就当然地要显得更为残酷了。对于任何一个来自于中国的新移民来说，不管他是东渡（如日本）西飞（如美、加），还是南下（如澳洲）北上（如俄罗斯、东欧），总之，遵循着“人往高处走”的原则，在一切被人们认为比中国发达、更具发展前途，或是并不一定比中国发达，但又比在中国更容易发展、发财的东南西北方国度里，不管他原来怀揣着的是“淘金梦”也好，“镀金梦”也罢，只要是在那个陌生的国度里，没有一份丰厚的遗产或是奖学金在等着他，那么，他所首先要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必然就是生存！“新移民文学”中的主人公们，尤其是出现于90年代初期的那些主人公们，为了这种生存大都付出了残酷的代价：《上海人在东京》中的祝月，为了早日偿还办赴日留学背下的35万日元债务，只好到没有马的“高田马场”去应征让人望之却步的苦役工。即使是在后来的“时来运转”，碰上了好心的老板，他所能干的依然还是建筑工地最苦最累最危险的活，其差别只在于那位为偿还历史感情债的前侵华日本“皇军”老板确实待他不薄，使得他的这份工作比较稳定，工钱较为合理，仅此而已。《北京人在纽约》中的王起明，那双8岁起就开始拉琴、一直受到重点保护的手，在湘院楼餐馆，一天十几个小时却只能泡在漂白粉、洗涤剂中，而且还惟恐工作不力被老板娘炒鱿鱼。初到纽约的第一个月中，他“一早钻地铁去餐馆，到餐馆就洗碗，回家的时候天又黑了”，整整一个月，他“还不知道美国的太阳是圆是方的呢！”《闯荡在东瀛》中的黄一勤，为了生存卖过血、洗过尸体。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了，每天打3份工，总时间在19个小时以上。此外，每周至少还要到语言学校上3次课。在每天都极度疲劳的情况下，为了能准时地打工、上学，“他创记录地买了五只闹钟。第一只钟九点开始闹，第二只九点零三分闹。随后，接力棒似的，每隔3分钟就有一只跟上来铃声大作。人太累了，眼睛都睁不开，也不想睁开”。在另外一

篇名为《狗念》(郑芸)的作品中,他的女同胞蕊对闹钟也有着同样的感受:“蕊现在最感痛苦的就是起床。闹钟突然尖利地划破漆黑,固执地把她从睡梦里拖出来,脑袋却使劲地往下坠。每次她都对自己说:算了,算了,不去打了,睡下去。可最后还是硬撑了起来。她想到了死,死了就能长眠不醒了,所以现在少睡多醒点也是应该的。死鼓励着她每日早早起床。”以上我们不厌其烦地罗列出来的这些例子,都具有着这样的共同特征:以长时间高强度的简单的体力劳动,去换取他们在那个国家生存、立足的最起码条件。这也是大多数新移民初抵他乡时(有的甚至是自始至终)的一种主要的生存方式,它在新移民当中有一个统一的叫法:“打工”!人在异域,身无分文,要生存,要读书,要还债,还要为日后的发展积累必要的基础,全部的希望就寄托在这“打工”上面。尽管几乎所有的打工者都诅咒打工生涯的艰难,可是,一旦找不到工打,所面对的却是比捱苦更为可怕的生存危机。因此,也就有了那句被不同国家的众多华人新移民誉为“五苦论”的“吃不着苦的苦比吃苦的苦还要苦”的流行语(《我的财富在澳洲》)。短短的一句话里竟一下子用了五个苦字,而且每一个苦字都有特殊含义,缺一不可。这里的“吃不着苦的苦”和“吃苦的苦”是两回事,前者说的是失业,后者指的是打工。明知是苦,还非得去找苦吃;倘若找不到苦吃,也就意味着生存要受到威胁。这就是大多数新移民中的“打工一族”常常会碰到的关于生存的二律背反。在众多的“新移民文学”作品中,我们随处都能看到作者们用不同的话语不同的叙写模式演绎着大体相同的生存故事。《我的财富在澳洲》、《流浪美国》、《绿卡梦》、《在那片天空下》、《到美国去!到美国去!》、《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东京都的福建先生》、《没有停泊地——一位留学生的经历》……美洲的、日本的、澳洲的、西欧的、东欧的;发达的、半发达的,只要是印下了新移民足迹的地方,就会留下诸如此类的不

同版本的故事。虽然，这些故事的发生地点不同，主人公的身份经历也各相迥异，但是，它们却差不多都有一个共通的特点，那就是，大多离不了这样的几个字：“为了生存”！

熟悉当代海外华文文学情况的人或许还记得，在六七十年代的海外华文文坛上也曾有过与当下的“新移民文学”相类似的一种文学现象——“留学生文学”。以於梨华、白先勇、赵淑侠等人为代表的“留学生文学”作家群及其代表性作品，由于精彩地描绘了六七十年代以来，从台湾出发留学欧美的青年学子们，在那个特定的历史年代里精神与文化的双重漂泊的情感历程，从而使得“留学生文学”成为那个年代风行一时的文学读本。然而，相比之下，近20余年来所形成的新移民群体，以及由这个群体中的作者们所创作的这一类“新移民文学”作品，与六七十年代的於梨华、白先勇、赵淑侠们，以及由他们所创作的“留学生文学”相比，不论是在创作主体还是作品风格方面，都有着迥然不同的区别：首先，不论是於梨华、白先勇、陈若曦、欧阳子，还是丛苏、张错、杨牧、赵淑侠等人，大多都是货真价实的留学生，而近20余年来的新移民作家中，尽管也有不少是名副其实的留学生，但从总体来看，其身份比之前者显然要驳杂得多；其次，尽管在新移民作家们创作的作品中，难免也有其前行者的那种漂泊无根、彷徨困惑的情绪流露，但由于其身份、地位的不同所决定的，他们更多的还是倾向于对生存的艰难的书写，尤其是在“新移民文学”的初期阶段更是如此。由于所处的社会时代因素、经济条件的不同，更由于整个新移民群体的成分要比60年代的台湾留学生驳杂得多，反正，在於梨华、白先勇、赵淑侠等人为代表的“留学生文学”中，几乎还没有看到过有如此集中的展现留学生生存困境的关于“生存书写”的作品。

“每一个新移民都有一个梦”，这是不少“新移民文学”的作者常常提到的一句话。是的，对于几十年来一直处于禁锢状态而

又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度的子民来说，突然有一天打开了国门，得以踏足那早就听说既富得流油又自由自在的西方世界的新移民来说，谁的心中不都揣着一个美好的梦想！“美国梦”、“日本梦”、“欧洲梦”、“澳洲梦”，虽然名称不一，但意思却是一样的，它们都同样是“自由”与“富足”的代名词。然而，我们也知道，梦想并不等于现实；在梦想与现实的连接之桥上，是可以也必然会产生或出现各种不同的“对接”形式与结果的。由于不同居住国制度、文化的差异，由于新移民们自身主观条件的千差万别，以及由于冥冥之中种种无法逆料的因缘际会等等内在外在因素的搅拌化合，使得新移民们的命运遭逢出现了斑驳陆离的排列组合。《北京人在纽约》中的王起明和郭燕夫妇，出国前都是北京一个交响乐团的提琴演奏家。从抵达纽约的第二天起，他们一个到湘院楼打工，一个在家织毛衣；到后来，凭着他们的聪明才智与运气，终于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拥有了自己的工厂拥有了万贯家财，实现了他们的“美国梦”。可是，仅仅是王起明的一次投资房地产的失误，又把他们逼到了濒临破产的境地。再加上女儿宁宁，恰恰又在这时候遭黑帮绑票撕票而过早地结束了年轻的生命，更是使他们痛不欲生。《东京都的福建先生》中，出身于福建山区的青年黄天民，借贷东渡扶桑，到东京独闯天下。他白天上大学念书，夜里奔波打工，又自办了“古大陆食品录象带公司”，积攒下了近亿日元的财产；在情场上，他结识了日本歌星中野洋子，由相爱而同居。一时间，可谓金钱和美女两相如意。谁知好景不长，由于卷入了东京黑社会帮派组织的纠葛之中，黄天明最后竟只落得个破产的结局。《我的财富在澳洲》中的罗伯特·牛，凭着小市民秉性所赋予的小聪明，为了每小时五块五还是六块的工钱，为了争取每周能有 90 小时而不是只有 48 小时的打工时间，在“MT 日本快餐店”与朝鲜老板娘玩起了老鼠和猫的游戏。而其中的辛酸苦辣，心灵挣扎，着实让读者为这

位出国前还是上海滩上小有名气的作家感到深深的不值和无奈。王起明、黄天民们，既品尝过美梦成真的喜悦，也吞咽过美梦成泡影的苦涩，而罗伯特·牛，既未曾有过成功，也就无所谓失败。然而，不论是王起明、黄天明，还是罗伯特·牛；不论是成功也好，失败也罢，他们那交织着血泪辛酸、苦乐爱恨、离合悲欢的人生悲喜剧，那大喜大悲、跌宕起伏的命运变幻，却是无比鲜活无比真切的。

如果“新移民文学”只是满足于对异国他乡残酷的生存现实的真切摹写和对变幻莫测的人生际遇的喟叹的话，那它们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一些新移民异域生活的生存纪实，与文学观照人生的深层属性必然存在一段相当的距离。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的“新移民文学”作者并不满足于此。尽管有些“新移民文学”作品确实存在着“倾诉”有余而“节制”不足的缺失，但是，就我们十分有限的涉猎范围来看，也还是有为数不少的作者能以理性的思考去烛照自己所走过的来时路所曾经历过的那段心路历程。譬如，《我的财富在澳洲》即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部作品虽然以“我的财富”标示书名，但读遍全书，主人公罗伯特·牛几乎从没有积累下什么可以称得上“财富”的东西，相反，在全书结束时，他虽然已还完了为办“留学”所背下的债务，有了“无债一身轻”的潇洒，但却因为一个意外的小插曲而失去了在“MT日本餐厅”的那份工作，又要为生存开始新的奔波。显然，作者在这里所指的“财富”，并不是那种有形的、足以让自己随意挥霍的物质财富，而是他在澳洲为生存所作的努力而积攒下来的、能够给他未来抵挡人生风雨带来启迪的宝贵人生经验，而这，才是真正的一辈子也消受不完的、真正的精神“财富”！无独有偶，颇有自传色彩的《茫茫东欧路》的作者凌一鸣，对自己两年有余的东西欧之行，尽管其间也曾有过种种让自己刻骨铭心的不愉快甚至是痛苦的经历遭遇，如为了生存走南闯北大“练摊”，“惊险

小说”般的“国境历险记”，莫名其妙地蹲过异国的监狱集中营，以及由于祖国的还不够强大而遭受到的屈辱等等，但他对此却丝毫不感到后悔，而是自豪地宣称：“我并没被国外那无情的灾难与厄运所吞噬，也没因回国后世俗的偏见与嘲笑所消沉。我失去的只是一些身外之物与幼稚可笑的幻想，我得到的将是让我终身受用不尽的经验和见闻。我还是我！”^①何其清醒何其自豪！而作品中时时穿插其中的对祖国与个人关系对人生价值的思考和议论，由于大都是对某一具体事件的“有感而发”，从而使得作品在行使其叙事功能的同时，也显示出一定的理性色彩。同样，在《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中，尽管评论界对作品的真实性多有诟病，但如果我们仅仅是将其视为真正的小说创作来对待的话，那么，作品中主人公周励所取得的事业成功的例子，已足以向我们昭示着这样一个人生哲理，那就是：人，即使处身于逆境之中，也要善于发现自身的价值；而善于发现和发挥自身价值的人，就终会有取得成功的希望。罗伯特·牛、周励们在自己人生道路上所获取的感悟，对我们的读者来说，不啻也是一种有益的人生启迪。

大雕塑家罗丹这样说过：“艺术就是感情”^②。的确，没有感情的艺术是不可想象的。从现代心理美学的角度来说，艺术其实就是心灵与心灵的对话，感情与感情的交流。十余年来的“新移民文学”之所以能够为众多的读者所欢迎所喜爱，并且渐成气候，引起了海内外华文文学界的广泛注意，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它们大都能以其真情的流露去感染千万读者。由于“新移民文学”中很大一部分作品就是作者本人亲身经历的摹写，而这些经历又大都是曾经让我们的作者为之刻骨铭心过的异国生

① 凌一鸣：《茫茫东欧路·序》，群众出版社，1993年。

② 载《罗丹艺术论》，人民美术出版社，1978年，第3页。

命历程中的爱恨悲喜，所以，当这些经历转化为“为情造文”的情感倾诉的时候，它们同时也就具备了感动读者的情感力量。凌一鸣在同一篇“序”中这样写道：“我从一场人生的幻梦中惊醒，求得了新的自慰与平衡。一种强烈的责任感驱使我，一种心中的积淀让我唯命是从——我要写！我要写出这两年来遍闯东欧西域的日日夜夜，那无时不涌集在我心头的无数海外同胞创业的艰难及内心世界的酸甜苦辣，写出我的那些磨难中的结晶——以此作为我自己的一份永久的珍存。”^①作者正是在这种不吐不快的心理驱使下，写下了他那长达两年的充满惊奇惊险的“海外历险记”。尽管，他所写成的《茫茫东欧路》是一部基本无甚文学色彩可言的纪实作品，然而，由于它所具有的亲历性和惊险性，以及字里行间时时涌动着的血泪深情，还是深深地吸引、感动着读者好奇而敏感的神经。《北京人在纽约》的作者曹桂林在作品的“前言”中这样交代过，他的这部作品，正是依照朋友的提示，按着自传体的路子写成的。而作品中王起明从一无所有到艰难创业到事业成功再到濒临破产的跌宕起伏的曲折经过，尽管因为“小说”所具有的虚构性提醒我们不能去干对号入座的蠢事，但它却又实实在在地处处映衬着作者饱含血泪的拼搏奋斗的过往履痕。曹桂林说他在书稿写成之后，“读着读着，掉了眼泪，读着读着，泪如雨下，通篇读完了，我也成了泪人了。”^②古罗马诗人贺拉修斯曾经说过：“你要我哭，首先你自己得感觉悲痛。”^③我们相信，像《北京人在纽约》这样能首先感动作者的作品，也一定能够感动它的读者，而且，事实证明，它也确实确实感动过众多的读者。

① 凌一鸣：《茫茫东欧路·序》，群众出版社，1993年。

② 曹桂林：《北京人在纽约》“前言”，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

③ 贺拉修斯：《诗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42页。

一位写作“新移民文学”的年轻作者这样说过：“其实漂洋过海者无非是为了寻找一种人生价值，至于这价值是金钱还是别的什么则因人而异。”^①的确，不论是留学深造，还是打工赚钱，也不论是经商，还是为移民而移民，毕竟不同于参加一趟“海外游”到国外转一圈看看风景就回来那么潇洒简单，但凡决意踏出国门的人，大都有着他的或清晰或朦胧的人生价值目标在指引着他。说寻梦也好，说寻找人生价值也罢，在这几十万的新移民大军中，美梦成真者有之，实现了自我人生价值者有之，但是梦幻破灭，事与愿违人生价值发生严重背离的也为数不少。然而，不管怎样，他们在异国他乡求生存谋发展的曲折坎坷艰难辛酸却是实实在在的。其中的艰辛之处难言之隐，远不是我们这些局外人所能体味了解于一二的。但是，不管怎样，“新移民文学”作品还是为我们提供了一扇窥探他们的异域生涯的窗口，一道认识他们身在异乡所走过的心路历程的轨迹。如果说，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巨著《人间喜剧》，给后世读者提供的是大革命前后法国社会尤其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全部历史的话，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八九十年代以来的“新移民文学”，从整体上也给我们提供了一幅中国大陆当代新移民闯荡世界的驳杂而真实的生活图景。尽管从艺术上来说，这一类着眼于新移民生存状况的“生存书写”作品，与大师大作之间确实存在着无法比拟的天壤之别，但无法否认，由于作品本身所具有的亲历性以及由此所蕴涵着的充沛而真挚的情感力量，赋予了它的别具一格的生存书写方式，还是使得“新移民文学”赢得了万千读者。

^① 莫然：《小小寰球——我写〈东瀛梦〉》，载《东瀛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79页。